

《花团锦绣:故宫后妃衬衣藏品赏析》,梁科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把花团锦绣穿在身上

王小柔

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与古人相遇,从他们使用的器物 and 穿过的服饰来揣摩已经沉淀在历史中的日子。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中国古代服饰展,在看展的过程中,一定会被那些精美的服饰所震撼,在看到服饰上细腻的花纹、花卉图案时,更会惊叹连连:“太美太精致了!”

除了惊呼“好美”“真好看”以外,一件衣服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花卉图案,它是为何人设计制作的,代表了怎样的含义……对于这些“门道”,很多人看了展品下面的标注,也依然一头雾水。甚至不少古装爱好者在故宫里拍摄清装照片时,会出现穿了清代的服饰却搭配了一双汉代风格的鞋,鞋龄少女错穿了“丧服”等问题,因对历史文化的一知半解而频频出糗,很是尴尬……

服饰爱好者该如何通过精美华丽的服饰外表,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不再出现“穿错衣服”的尴尬?展览迷们又该怎样在“热闹”的同时还能看懂“门道”,不再单纯地用匮乏的语言进行表达?《花团锦绣:故宫后妃衬衣藏品赏析》里就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本关于故宫后妃衬衣的观赏攻略,让读者在惊叹古人制衣工艺精湛之余,更多了一份敬意。

清朝衬衣“门道”多

这实在是一本厚重的书,华美服饰里装着一部清史。

我们常能看见年轻孩子穿着汉服挤地铁,但很少能看见有人穿着清朝的服饰逛大街,估计是因为衣服的工艺更繁复吧。故宫后妃衬衣藏品,以往经常混在清宫服饰中,朝袍、龙袍和整衣才是主角。而本书选择不被重视的衬衣进行研究,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衬衣文物的精美,进而改变过去认为晚清后妃服饰中整衣才是最精美的印象。衬衣内外皆可穿用,与整衣图案接近,精巧的制作更是毫不逊色。

古代用丝绵絮做成的长及脚面的长衣被称为袍,在中原地区沿用千年后,它的定义也渐宽泛,凡长及膝以下的长衣皆可以

此称之。清代满族人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身份地位高低皆喜着袍,因军民分八旗,故旗人长衣也称旗袍。清代帝后有礼服(祭服和朝服,两者合一)、吉服、常服、行服和便服,上层社会女性包括皇后、妃子、外命妇和大户家族女眷等,其官服有朝服和吉服。皇后朝服由朝裙、朝袍和朝褂三件为一整体组成,吉服由外褂和袍两部分组成,便服有便袍、整衣、衬衣、马褂、坎肩和袄等。

慈禧十分青睐整衣两衣,所以它们工艺上的精美程度常常超过礼服和吉服,其细致的织绣工艺、华丽的装饰和繁缛的缘边镶滚,成为后妃服饰中最具华彩的乐章。故宫所藏衬衣约1100件,时代标有雍正、嘉庆、道光、同治和光绪,很多衣服和布料都标注着交回敬事房的收藏日期,准确制作年份应该会更早。如乾隆时的“绛红地勾莲蝠织金缎夹袍”和“月白色织彩花卉蝶织锦夹袍”,这些长服是舒袖衬衣。书中说,有衬衣特征的最早实物是在道光时期,织造沿袭暗花面料的传统,仍以素色为主,为挽袖衬衣。道光后则缂丝衬衣居多,其他还有织金缎,妆花面料则没有。同治、光绪时期宫中追求个性时尚,整衣、衬衣用量很大,此时衬衣各色彩绣和缂丝并重,除舒袖衬衣外,还出现了半宽袖衬衣。这种衬衣形式接近整衣,袖长及肘,有单层或多层袖口,在官藏衬衣中占比较大。

从技艺到图案都讲究

每翻此书一页,图文互衬之下,心中仅留下两个字:“讲究!”

衬衣起初作为满族男女均穿的内衣而得名,既可内穿也可外穿。景山寿皇殿与故宫中所藏帝后画像及行乐图有百余幅,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整理出版的帝后像中,皇后大多穿礼吉之服。《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中慈禧及后妃们照片中所穿,大部分是衬衣,她们日常穿用或梳两把头或戴大拉翅,常穿系领巾。

皇宫里的裁缝铺每做一件衣服,给谁做、用什么料子、图案、技法等都有明确规

定。内务府广储司原有银裘缎衣四库,后增设茶瓷两库,负责供办皇室成员的四季衣服、缎匹、皮裘和绒线等物,其数量样式由礼部定好后再加办。内务府下设六作及各房,将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或修制成为成品,亦为内外提供赏赐物品。广储司的工匠由全国召集而来,技艺精湛,艺术修养也很高。他们根据皇室成员的喜好为其提供相应的创作服务,这促进了宫廷审美和艺术风格的形成。

雍正后,该司逐渐成为采办物品的地方,优秀工匠多在造办处,由造办处负责修制皇帝的御用物品和官廷物品。康熙时,造办处初设于养心殿,后大部分迁至慈宁宫。造办处有不少与服饰制作有关的作坊,其旗匠、南匠和其他招募的民间匠人,依据画样及口耳相传的技艺制作成品。礼服和吉服,由礼部等按典制设计出图样,交由画匠绘出小样,再由各作坊制作,皇帝喜欢的则需亲自审阅后方可成造。雍正时,画匠隶属画作;乾隆时,聚于如意馆,称画人。按照当时服制绘制的《皇朝礼器图式》,将服饰制度以图像形式呈现,保证了其严谨性,促进了清朝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播。

衬衣的衣料多是在春秋时节,由内务府汇总官内所需制作的服饰类型数量等,拟定清单后交由如意馆画师,由其设计并绘好各官所需图样,各官主位审定、皇帝同意后,清单和画样送江南三织造等各地官营织造机构,按穿着者身材尺寸量身织造,成品完工后送京缝制。故宫目前留存有图样约3400件。

衬衣的成品或者半成品面料,主料是蚕丝,以织造和刺绣为主。这是清朝人通过艺术的手段和方法对自然事物、客观世界的描绘与升华。清宫衬衣装饰图案的题材包括植物花卉、动物、文字、几何、人物、器物、自然物和吉祥组合等。衬衣花卉的形式,花朵要向人如迎,俯如思,仰如悦,侧如醉。花姿横则恬静闲适,斜则潇洒豪放,曲则柔软婉约,直则庄重威严,垂则轻柔飘逸。



本书插图

在·线·阅·读

位尊德高——牡丹

牡丹,我国特有的传统名贵花木,牡丹花型硕大,花头肥短,复层花瓣,花瓣边缘有云曲瓣,密集多层且雍容饱满,成团如聚水魄。清代康熙牡丹各种造型多沿袭明代,但都瘦劲不肥,刺绣用色浓重,叶注重反差,比较写实。

雍正牡丹比乾隆有精神,极具巧思,可称雍容典雅端庄,如锦中牡丹花头大,叶脉用金,叶片除绿色,还有枣红和青雪等,有小卷起用蓝或红。

乾隆牡丹,秀中有俊,如锦中造型潇洒,多忍冬夔龙状叶;织金锦花头及瓣上小下大,还有的瓣如火焰,叶沿袭雍正一半红一半金;漳缎牡丹娇艳,云曲瓣堆簇如梯形,庆记本机的则聚如捧心;绫绣的瓣内白外黄少敷红边,叶深蓝和浅绿两色,十分端庄淑雅。

嘉庆牡丹端庄秀雅大方,万源号妆花缎的缠枝牡丹,瓣有云曲和三突起,花团锦簇;杭州织造的风格,喜欢大花头稍侧成椭圆,掌状叶深绿分两半翠色,如延丰款的织金缎和常显款的锦即是如此;绸绣花头聚集如水滴松果,瓣叶正翠。道光牡丹秀雅娴适,文人气十足,大部分中规中矩,如金心闪的花蕊金线,造型杂乱随意;妆花缎的瓣翠翠色金线勾边,还算大气;缂丝的花蕊螺旋状,云曲瓣设计出小翻卷,叶脉黑叶片深绿两色,并不翠色;绸绣的花头亦聚如水滴松球;缎绣的有瓣如银锭的,有聚合如玫瑰的,多端庄典雅大方,在便袍和吉服上也有;绫绣的出现锯齿形云曲瓣,翠色层层如波浪。

咸丰牡丹绸绣沿袭道光锯齿花瓣,虽拙但还算端庄,后期同治亦如之;缎绣团牡丹如玫瑰,有道光之雅秀;纱绣绣五花塔状实花盘状,叶正反翠皆有,婀娜娇艳。

同治牡丹绸绣端庄大气,瓣聚如玫瑰,花叶线条流畅;光暗的暗花缎蕊如莲台,写实自然,端庄耐看……

或紧张的瞬息时刻,以此作为作品构建的基础,而且着意于刻画这些“大历史”事件背后所潜藏的“小人物”信息,从而对历史洪流之下普通人颠沛流离的命运,进行深度的关注与深入的挖掘。

作为《王小波传》的作者,房伟对王小波整体创作和个性性格极为熟悉,其作品中亦充满王小波式的戏谑与夸张,背后则是作者对时代和时代中人的理解、同情和反思。比如在《“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对于假扮的“杭州鲁迅”先生的真实心境,房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那个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他们和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那种底层生存的知识分子状态,又与当下有着怎样的双生性的复杂关联?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只能将一个小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鲁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捞他,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而鲁迅先生的问题,关乎现代中国的很多关键问题,至今依然对我们有启发。”

在房伟看来,“普通人在大时代之中挣扎,更多的是顺从欲望的驱使,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与孤独也正在于此。鲁迅以自身为柴薪,燃烧自己,照亮了普通人的命运,但他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被人理解。而‘假鲁迅’的觉醒,也暗示了我的乐观态度,也预示着普通人和鲁迅精神沟通的可能性。”

作家与死亡的话题、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永远是幽深且迷人的。不妨从《杭州鲁迅先生》出发,看看最后时刻的沿途有着怎样别样的风景。

关注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

焦亚坤

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种缓慢受锤的过程。”1997年4月,44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王小波研究专家、《王小波传》最受欢迎版本之一的作者房伟,在最新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中向其致敬:“人过四十不值得,那之后的生活,就是被慢慢锤击至死。”

《杭州鲁迅先生》收录房伟近些年创作的题材、类型多样的八篇作品,呈现新奇多变的样貌。其中既有幻想色彩的篇章,也有当代市井风情故事,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小说系列:假冒的“杭州鲁迅”先生“历险记”、苏门答腊的夏天郁达夫意外失踪的秘密,以及历史与现实交汇处,1997年王小波离世时的心路历程……

房伟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底,自由穿梭于作家与学者身份之间,书写了关于自我、关于命运、关于未来的另一重想象。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中的间隙,谜点重重却暗藏玄机,借助文学家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历史有了一个更为合理妥帖的结论。有的篇目则充满隐喻的未来狂想,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摩擦和悖论在作品中也展露无遗。

比如在《外卖员与小说家》这篇里,外卖小哥建民和小说家宇文无量成为私交甚笃的朋友,也是对当代外卖员“困在算法里”的一种文学回应。小说家和外卖员看似身份、

工作相隔甚远,前者可以天马行空足够自由,后者却备受时间空间束缚,这种组合潜在地运行出两种价值的对话与交锋。外卖小哥象征算法时代被异化的丧失主体性的人,而小说家则代表着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格。“在自我意识与工具理性的碰撞之间,小说产生了最具大数据时代气质的张力。”这也是当下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作家的现实焦虑和对未来科技时代的一种预判。

“我希望从不同角度,在文字、历史与未来之间,探索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探索人类精神的可能性。在这样想法的鼓动下,我试图写出一种‘力与美’的历史小说。历史的伟大与壮丽,与历史的残忍冷酷,历史丰富的细节与充满想象力的美,这些东西让我着迷。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我感到了写作的快乐。”房伟这样说。

房伟曾看过很多作家的史料,对很多中国现代作家的死亡问题产生了兴趣。他认为作家比一般人敏感,他们将隐秘的生命体验与诉说的冲动诉诸文字,就形成了种种“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故事。本书中,大部分作品聚焦文学大师或文学写作者的最后时刻,鲁迅、张爱玲、郁达夫、王小波……



《杭州鲁迅先生》,房伟著,译林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从中照见文学、历史、政治、巧合乃至身体疾病、精神疾病等对文学个体的影响。

真假鲁迅相遇在动荡年代的书店一隅,日本学者按图索骥郁达夫的死亡之谜;濒死时刻,自电脑屏幕游曳而出的海妖如何与王小波发生纠缠;去世的小说家如何潜行篡改外卖员的脑内世界……房伟选取历史或谈谐



他人眼中的卡尔维诺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

【意大利】卢卡·巴拉内利、埃内斯托·费里罗 编著

译林出版社

2023年10月

从现实到寓言,从个人到时代,两位昔日挚友在本书中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追忆卡尔维诺的写作与人生轨迹,为作家的轻盈叙事之美写下注脚,以此纪念那段不可磨灭的岁月。

书中收录日记、信件、私人回忆、同时代文章近20万字及300余幅珍贵老照片,部分图片来自卡尔维诺的家庭珍藏,由遗孀埃斯特·卡尔维诺首次公开,其余大部分来自卡尔维诺档案馆,现存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从传记文字中可以读到卡尔维诺的家谱记忆、学生岁月、青年参与游击战的经历,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编辑时光,倾听卡尔维诺谈“为什么写作”,深入了解写作的必要条件、特殊笔调以及翻译的深层含义……这是一份知识分子的传记,更是卡尔维诺“如何成为卡尔维诺”的故事。



宇宙诞生的新视角

《时间起源》

【比利时】托马斯·赫托格 著

中信出版·鹤鸣螺

2023年11月

霍金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新宇宙学,颠覆了他在《时间简史》中提出的关于时间起源的观点。本书作者正是这篇论文的合著者。他们凝视着宇宙全息图,探寻其中的量子力学秘密,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进化,在这个进化中,物理定律变得更简单,粒子、力甚至时间本身都消失了。这一发现使他们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物理定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它们所统治的宇宙的形成而诞生和共同进化的。该理论针对宇宙的起源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新达尔文主义观点。

《时间起源》对宇宙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新视角,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对自己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的看法,是霍金留给人们的最伟大的理论遗产。



活给别人看的女人们

《五爱街往事》

三胖子 著

新星出版社

2023年10月

这是一本由底层女性书写自己及周围女性命运的作品,记录时代沉浮下小人物的市井人生、东北社会的世相百态。

五爱街是一个缩影,由个体人生故事的断面,拼合出一个高速流动的时代镜像。这里活跃着一群不断寻找机会、敢于向命运叫板的小人物,尤其是一个又一个拼命活给别人看的女人。丹丹、宽姐、慧姐、五月……在档口,她们是有着微薄生命力、懂得看行情涨落、知道何时出手、能靠自己挣下七位数的“铁娘子”。但面对家庭、婚姻、爱情,她们又压抑隐忍、默默付出,一次又一次被命运的凝视与压迫困住。经济野蛮生长的背后,是价值的失焦,现实选择之下,是幽深的人性逻辑;无法逃脱的环境局限中,人在探寻真正的独立、黯淡的城市网格里,有普通人的梦想。作者以喷薄的市井活力对冲现实的艰辛,以普通人的真实映照时代的真实。

因为热爱,所以坚定

陈艳敏

《从写作到出书》,何丹、周华诚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一个致力于商业观察,一个倾心于文艺创作,貌似不怎么搭界的两个人,能坐下来聊出激情,聊出火花,聊出一本书来,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对何丹不了解,但周华诚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欣赏的一位作家。我喜欢他文字里的那份质朴、通透和唯美,他的文字与我的心性相合,因此读来是种享受。事实上,作家从媒体转行而来,是一个出版人,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起做喜欢的事,他将这些事上升到生活美学,上升到人生哲学,而后变成一本一本的书不间断地出版,这个过程愉快而美好。

周华诚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一本厚厚的书。他离开村庄上大学,来到县城当医生,去到都市做记者,然后又回到乡村“父亲的自稻田”。他在那里一边劳作一边创作,开拓他自己的劳动田园和精神家园,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总之,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然,何丹、华诚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聊得投机,除个人友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图书出版。两人都从媒体转行而来,无形中更多了一些共同语言,这本书,是两位从事出版十余年的业内人士的谈话录,也是他们关于写作、出版的经验之作。

写书出书,被两位看作神圣的事业,是他们的衷心所爱。何丹说,没有爱,在这个行业里是走不远的。周华诚说,因为热爱,所以坚定。两位的兴趣或许迥然不同,但热情却无差异,心怀理想,总归是件美好的事,敞开心扉畅谈理想,那更是一件美上加美的事了。

华诚与何丹的这本书旨在与创作者分享经验,作为与他们有着相似经历的一位读者,他们的谈话也引发我许多共鸣。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有种“参与感”,仿佛自然地“加入”了他们的聊天,与两位作着无形的对话,有共鸣,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这种聊天是愉快的。

有一些话题是华诚和何丹作为同行的探讨与交流,如为什么要做书?如何做成商业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为何心中须装着读者?当华诚说:“如果作者心里有这样一个读者形象,他在写作过程当中就会让自己的文字更加精准,整个项目也更加清楚。”从做书、做项目的角度,华诚无疑是对的,但我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反对的声音:目的性太强了,我不喜欢。出版是写作的必然目的吗?出版是写作的全部意义吗?写作的意义不可以是写作本身吗?不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写作吗?写作,真的高于生活、重于生命吗?写作不可以如呼吸般自然流畅,无知无觉吗?出版不可以只是写作顺带的副产品吗?当何丹说写作本质上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文字是最有力量的载体,文学要经过训练时,我想透,沟通不可以自然通透,不假思索吗?写作不可以是直接的说话,或者是自由维度上的另一种真实的生活吗?是写作促使思考,还是思考促使写作?是生活在后,写作在前,还是写作在前,生活在后?在生活面前,写作难道不应该退后吗?不同的回答是不同机缘下的不同选择。读书也一样,站在业余的角度,我不喜欢附加外在目的的阅读,只喜欢顺遂心性,随遇而读,给自己以最大的乐趣和自由。

何丹说,读书就不读好。我在旁批注:也未必,谁知道呢?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叔本华则直接反对读书,坚信自己才是自己思想的源泉。这些观点都不无道理。尤其如今貌似繁荣的出版行业背后,名为为利的粗制滥造有多少呢?泥沙俱下的现实情形之下,读者是否必须具备鉴别的眼光呢?若要引领阅读,那对读者和出版者就是更高的期待了。任何一个时代,包括出版在内的行业真正的佼佼者其实是少数。怀有理想的写作者和图书出版人是我敬佩的。

华诚做书是有追求的,他在后记中说:“当我在做书的时候,希望每一本书都是美的,这种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是思想与商业的完美融合,是创作与出版的相互成全。”但这并不容易。出于探索或出于需要,出版前置、常变常新当然是好的,只是不知不觉中难免受到太多纷扰,从而掺杂背离原点的东西,哪怕一点,恐怕也会影响质地。平素的书华诚,种田、写作也做项目做活动,愿他始终能在宁静与热闹间找到平衡。